

中国教育通史

General History of
Chinese Education

11

清代卷(下)

金林祥
本卷主编

阎国华
李国钧
王炳照
总主编

顾明远
学术顾问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教育通史

General History of
Chinese Education

11

清 代 卷
(下)

金 本
林 卷
祥 主
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教育通史·清代卷(下)/金林祥主编.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8

(中国教育通史/王炳照, 李国钧, 阎国华总主编)

ISBN 978-7-303-15871-3

I. ①中… II. ①金… III. ①教育制度—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①G52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13368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9014
北师大出版社教育科学分社网 <http://jywx.bnup.com>
电子邮箱 jiaoke@bnupg.com

ZHONGGUO JIAOYU TONGSHI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 mm × 260 mm
印 张: 27.5
字 数: 408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38.00 元

策划编辑: 郭兴举	责任编辑: 郭兴举
美术编辑: 纪 潇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校对: 李 茵	责任印制: 陈 涛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编辑委员会

学术顾问 顾明远

总主编 王炳照 李国钧 阎国华

修订工作组组长 田正平

修订工作组成员 田正平 金林祥 俞启定 于述胜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述胜	马 镛	王建军	田正平	乔卫平
刘 虹	宋大川	吴宣德	苏渭昌	金林祥
郭齐家	俞启定	施克灿	顾明远	梅汝莉
雷克啸	熊贤君			

总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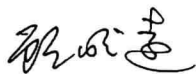
《中国教育通史》即将付梓。首先我要向田正平、俞启定、金林祥、于述胜以及参加这次修订编纂工作的学者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不辞辛苦，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完成这部巨著。

《中国教育通史》是将 20 世纪 90 年代出版的王炳照、阎国华主编的《中国教育思想通史》（8 卷本）和王炳照、李国钧教授主编的《中国教育制度通史》（8 卷本）合编而成的。原来两部著作是三位教授的力作，本来由他们合作主持合编修订中国教育通史是最合适、最理想的，可惜李国钧、王炳照两位先生都先后离世，阎国华先生年事已高，于是由田正平负责的修订小组接手完成，原作者都基本上参加了此次修订工作。

王炳照、李国钧、阎国华都是我的朋友，我们曾经多次合作过。我主编的《中国教育大系》中《历代教育论著选评》和《历代教育制度考》两大系列就是王炳照、李国钧两位编纂的。阎国华则参加了我主编的《教育大辞典》的工作。李国钧先生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史学，特别是研究中国教育制度史的权威，不仅著作丰硕，而且培养了一批人才。阎国华先生是河北大学教育史教授，兼通中外教育史。王炳照则是我们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是我的同事，我对他有更深的了解。他先后主编了《中国教育思想通史》《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等专著，又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的编纂工作。他对我国古代私学、书院和科举制度又深有研究。他不仅研究中国教育通史，而且拓展了区域教育发展史的研究，并且对教育史学也有较深的研究和独特的见地。

王炳照、李国钧、阎国华是我国教育史学界承上启下的人物，他们师承舒新城、孟宪承、毛礼锐、陈景磐、沈灌群、滕大春等老一辈教育史学家，“文化大革命”以后，他们接过这批老先生的班，开拓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他们坚持教育史研究中“古为今用，以史为鉴”的史学原则，探寻中国教育思想产生、发展及其演进的历程，挖掘历代教育思想的丰富内涵，总结前人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揭示教育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研究中国教育制度的形成、发展和变化的历史，回答教育制度作为一个历史存在物的存在特性，及其与现实存在的教育制度之间的关联，探讨现代教育问题的历史根源。

《中国教育思想通史》和《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是两部巨著，各有 300 多万字，把两本书合并起来，编纂成一部《中国教育通史》，其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在田正平、俞启定、金林祥、于述胜几位教授主持下，原作者的积极配合下，经过对两书的合并、调整、修订、创新，终于完成了我国第一部最完整的中国教育通史。这部书的出版，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一是，这部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教育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二是，标志着我国新一代教育史学家的成长，因为参加修订工作的大多是各校中青年学者。李国钧、王炳照、阎国华开展了中国教育史研究承上启下的工作，现在后继有人，值得他们欣慰了。



2013 年 3 月 6 日

本卷导言

从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至 1911 年辛亥革命以前的教育制度，即通常所说的晚清教育制度，虽然时间不长，仅有几十年，在中国教育制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却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中国教育制度从传统走向近代的重要的转型期。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轰开了清朝闭关锁国的大门。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出现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剧烈变革，教育体制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形式完备的封建教育制度虽然存在，但已徒有虚名。官学名存实亡，书院积弊丛生，私塾困难重重。传统教育制度已完全不适应中国社会向近代变迁的客观需要，与世界教育潮流也格格不入。它已经腐朽没落，走到了尽头，必须实行变革。这种变革，是伴随着对传统教育的批判和对西方教育的学习而进行的，它以多种表现形式逐渐展开，渐次深入。

以林则徐、龚自珍、魏源为首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在无情地批判传统教育的空疏无用，要求改革八股取士制度、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的同时，积极主张“悉夷”“师夷”，喊出了我国近代学习西学的先声，迈出了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第一步，开了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变革的先河。

太平天国是我国近代史上一次波澜壮阔的农民革命运动。与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不同的是，它在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建设。它以拜上帝教作为文教建设的指导思想，猛烈抨击孔孟儒学，建立政教合一的教育制度，实行男女教育平等。它编写各种书籍作教材，废除“四书”“五

经”教育内容，积极改革科举制度，重用知识分子，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太平天国个别领袖人物如洪仁玕等，虽也曾受到西学影响，提出过若干具有近代色彩的教育主张，但总体而言，太平天国在文化教育方面的种种举措，反映了农民阶级变革封建教育的强烈愿望和要求，虽不代表时代发展的方向，但不失其积极意义。

从19世纪60年代起，洋务派把地主阶级改革派“向西方学习”的口号变成了行动。他们创办了我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批新式学堂，派遣了最早的官费留学生，培养了中国第一批新型人才，虽然数量有限，质量差强人意，但其意义不可低估。毕竟它在被封建教育封闭的圈子上凿开了缺口，迈出了学习西方教育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开始了中国传统教育的革命性变革，宣告了近代中国新教育的产生。

甲午战争惨败，民族危机加剧。痛定思痛，人们更坚定了向西方学习的选择，加快了学习的步伐。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宣传鼓吹在前，“百日维新”中的一系列教育改革在后，19世纪末的神州大地掀起了一个更为广泛深入学习西方教育的高潮，从而将近代中国新教育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虽然随之发生的戊戌政变使新教育的发展一度横遭厄运，但它终究不可抗拒，不久又焕发出勃勃生机。

20世纪初，清政府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统治，不得不宣布实行“新政”，在教育制度上进行一系列改革。将全国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学堂，大力发展新式教育。提倡向“强敌”学习，积极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形成留日高潮。1902年和1904年，分别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建立近代学制。随后，又于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在中央设立学部，在地方设立教育行政机构，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较为完整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所有这些，标志着近代中国新教育制度的建立，中国教育初步完成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在晚清教育的发展进程中，教会教育身份特殊，作用重大，值得重视。它是由外国传教士或教会在中国设立的不同于中国传统教育的异质教育。它有自成体系的运作方式、课程设置、教科书的编制和选用、学业评价以及管

理体制。教会教育具有明显的双重性。一方面，它是西方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获取的教育特权，其目的在于培养教徒，扩大教会势力，使中国“基督教化”，具有文化侵略性和奴化性；另一方面，相对于晚清封建教育，它又是一种先进的西方教育。它对于中国教育的普及和提高，新型人才的培养，对于西方先进文化科技知识的传播，对于教育观念的更新和教育理论的发展，对于中国教育从传统走向近代，在客观上具有积极推动作用。因此，教会教育又具先进性和进步性。

以上所述，是晚清教育制度发展的基本线索，也是本卷各章重点阐述的具体内容。

本卷撰写者，按章节顺序依次为：金林祥（前言，第三章第二节“二”、第三节和结语）、周瑾（第一章）、庞守兴（第二章、第六章）、张蓉（第三章第一节）、许国春（第三章第二节“一”）、叶存洪（第四章）、赵俊杰（第五章）。

在撰写过程中，我们参考和吸收了学术界尤其是中国教育史学界前辈和时贤的研究成果，在此谨表谢忱。受水平和时间限制，书中难免有不妥之处，敬祈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目录

第一章 晚清封建教育制度/1

第一节 晚清教育制度的衰败/1

- 一、官学名存实亡/2
- 二、书院积弊丛生/10
- 三、私塾困难重重/17

第二节 地主阶级改革派主张改革封建教育/18

- 一、改革八股取士制度/18
- 二、主张经世致用之学/22
- 三、倡导学习西学/36

第二章 太平天国的教育制度/50

第一节 太平天国的文教政策/50

- 一、以拜上帝教作为文教建设的指导思想/51
- 二、反对孔孟儒教的政策及其演变/55
- 三、重用知识分子的政策/64

第二节 太平天国教育的组织形式与内容/71

- 一、教育组织形式/71
- 二、教育内容/83

第三节 太平天国的科举制度/88

- 一、《钦定士阶条例》中规定的科举制度/88
- 二、实际施行的科举制度/91

第三章 近代中国新教育的产生/95

第一节 各类新式学堂/95

- 一、外国语学堂/95
- 二、军事学堂/102

三、科学技术学堂/106

第二节 著名的新式学堂/112

一、近代中国第一所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112

二、近代中国第一所海军制造学校——福州船政学堂/130

第三节 近代留学教育的兴起/144

一、容闳与幼童留美/145

二、派遣留欧学生/151

第四章 近代中国新教育的发展/162

第一节 甲午战争后教育的新进展/163

一、维新派强调开“民智”、育“新民”/163

二、效法西方，建立近代学制成为教育界的普遍要求/182

三、两级制、三级制普通学堂的出现/189

第二节 “百日维新”时的教育改革/202

一、百日维新期间重要教育改革措施概述/202

二、废除八股考试，改试策论/205

三、维新运动时的书院改学堂/216

四、设立专门学堂和实业学堂/223

五、创办京师大学堂/228

第五章 近代中国新教育制度的建立/246

第一节 书院改学堂/247

一、戊戌政变后书院的改制/247

二、新政时期书院重新改学堂/249

三、书院改学堂评价/254

第二节 留日教育高潮/256

一、留日高潮的历史背景/256

二、留日高潮概观/263

三、留日高潮的特点和影响/272

第三节 近代学制的建立/279

一、《钦定学堂章程》的制定与颁布/279

二、《奏定学堂章程》的制订与实施/289

三、新式学堂的发展/316

第四节 废除科举，设立学部，颁布教育宗旨/329

一、废除科举制/329

二、设立学部和地方教育行政机构/339

三、颁布教育宗旨/351

第六章 教会教育制度/354

第一节 教会学校的萌芽/354

一、传教士来华办学的开始/354

二、利用不平等条约获取办教育特权/357

三、早期教会学校的特点与成因/359

第二节 教会教育的普通学校制度/367

一、教会学校发展的缘由/368

二、教会小学的发展/374

三、教会中学的发展/382

四、教会大学的发展/398

第三节 教会教育的其他相关制度和机构/406

一、职业教育/406

二、女子教育/408

三、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和中华教育会/410

结 语/415

人名与专业术语索引/418

参考文献/422

第一章 晚清封建教育制度

19 世纪上半叶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穷途末路的时期，此时的中国千疮百孔，危机四伏。种种社会矛盾以及财政、武备、吏治等难题摆在人们面前，土地的高度集中和日益加重的地租盘剥致使农民起义频频不断。与此同时，外强交逼，祸在眉睫，中国面临着千古未有之变局。但清朝的统治者仍然浑浑噩噩，夜郎自大，沉醉在天朝大国的歌舞升平之中。清政府奉行专制主义与排外主义两大文教政策，使教育的发展笼罩在一片争名逐利、脱离现实的沉闷肃杀的气氛中，衰败不堪的教育已不能发挥维护封建社会生存与发展的作用。鸦片战争中，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用大炮轰开了清朝闭关锁国的大门。晚清封建教育已远远落后于西方教育，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强烈的冲击。以龚自珍（1792—1841）、林则徐（1785—1850）、魏源（1794—1857）为首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在猛烈批判传统封建教育的基础上，提倡“经世致用”学风，主张向西方学习，开中国近代史上学习西方的先河。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思想由此发端。

第一节 晚清教育制度的衰败

从满清贵族入主中原到鸦片战争爆发，这近两百年来的中国文化教育受制于清朝统治集团的两大文教政策，一是专制主义；一是排外主义。这两大文教政策使文化教育得不到外来因素的刺激，直至鸦片战争爆发仍保持着传统封建教育的特点。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晚清教育制度正是这种腐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治经济的反映，已经到了衰败不堪的境地。

一、官学名存实亡

晚清的教育制度在形式上是十分完备的。在中央设有国子监，它既是全国最高的教育行政机构，又是中央官学的最高学府。此外，还有宗学、觉罗学、八旗官学、景山官学、咸安宫官学、算学和俄罗斯文馆。地方上设有府学、州学、县学、卫学、社学、义学和井学。但实际上，这些官学徒有其名。“迄于嘉庆，月课渐不举行。……嗣是教官多闾茸不称职，有师生之名，无训诲之实矣。”^① 尤其是嘉庆、道光之后，“官学积渐废弛，八旗子弟仅恃此进身。教习停年期满予录用例，月课虚应故事”^②。可见在晚清，随着整个封建制度的逐步瓦解，官学也逐渐名存实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官学教育以科举为依托

自从科举制度产生以后，封建官学就逐渐成了科举的附庸，到了晚清，官学则完全成了科举考试的附属品。官学教育的目的、内容、方法等，都围绕着科举考试进行。科举考什么，学校教什么；科举怎么考，学校也就怎样考。官学教育完全以科举为依托，这突出地表现在，教育的目的是通过科举以求功名，即“储才以应科目”。清朝历代统治者虽然都强调育才的重要性，但在学校与科举的关系上，他们更重科举，科举是学校教育的核心。顺治十年（1653年）上谕“贡明经，举孝廉，成进士，何其重也！”^③ 肯定了学校教育的目的是应举入仕。晚清，这种状况愈益突出，致使“天下之习，不惟其教，而惟其所取，所取而为科举之文欤？则其学为科举之学”^④，科举成为士子的进身之阶和求取功名的敲门砖。因

①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106卷，第31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② 同上书，第3111页。

③ 《清文献通考》卷六九，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上海图书集成局铅印本。

④ 璩鑫圭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鸦片战争时期教育》，第158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此，“考其学业，科举之法之外，无他业也，窥其志虑，求取科名之外，无他志也”^①。显然，清朝教育的目的是通过科举以求功名，致使教育的重心不在学校而在科举，学校只为科举做准备，教育自然不能得到正常发展。正如有的论者所云：“国家设立学校，而以科举道之，故教化不行；教化不行，故人不事学业。以不事学业之人，又无恒产以资其生，则其心之放辟邪侈，有不期然而然者矣。于是乎学校多游民矣，故曰科举之法兴而学校之教废也。”^②

同时，教学内容空疏无用。“八股”考试自明代出现，到了晚清，八股考试已经发展成一套十分呆板、机械的考试格式，在命题上出现了一些十分偏怪的“截答题”“枯窘题”，考试题目“往往深求隐僻，强截句读，破碎经文，于所不当连而连，不当断而断”^③，使得学者无所依据。考试内容空疏无用，致使教学内容也是空疏无用的八股文。尽管八股文人以及科举出身的官吏中也有许多聪明人士，但是“今尽困天下之聪明才力于场屋中，而场屋之士，又尽一生之精力，不为效命宣劳之用，徒用之于八比、小楷、试帖无足用之物。天下贸贸，莫闻大道，而其试之也，又第取之于字句点画间，其亦可谓靡靡无谓之术矣”^④。科举所取之才，除了精通八股文，对其他一切古今治国之体、朝廷礼乐之制，兵刑、财赋、河渠、边塞之利病，漠不关心，而一旦授之以官，则不知所措。更有甚者，“既不具论，即其所言，类又剿窃浮靡，聊冀幸售，使执其以问，其人将有不自解其何故而云然者，则所言之物，亦且不可复问”^⑤。如此，导致许多士子竟不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高宗，是哪一朝皇帝”^⑥。梁启超在《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中也有同样的批评：“故自考

① 盛康编：《经世文续编》卷六五，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盛氏思补楼刊本。

② 同上。

③ 璩鑫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鸦片战争时期教育》，第83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④ 同上书，第74～75页。

⑤ 同上书，第154页。

⑥ 徐珂：《清稗类钞》第12册，第3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

官及多士，多有不识汉唐为何朝，贞观为何号者。至于中国之舆地不知，外国之名形不识，更不足责也。”^①可见，晚清教育内容之空疏无用到了何等地步。

晚清官学教育已腐朽到极点，科举考试使庸庸碌碌之辈侥幸迭进，有奇才异能的人，由于科举所困而难以脱颖而出，致使人才贫乏。而这一切正是“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学，惟科举之文”^②的恶果。

（二）“教官多昏耄”，滥竽充数

清朝各官学的教师，规定由各省的督抚学政等政府官员负责考核。清政府对教官提出严格要求，明确其职在教诲，务必严立课程，用心讲解，如或怠惰致监生有戾学规者，堂上官举察罚治。同时还加强对教官的考核，按其文行及训士勤惰，随时荐黜。康熙年间，由直省巡抚主持教官考试，分别等第，四等以上给凭赴任，五等学习3年再试，六等革职。雍正初年更是严格，三等以上才能给凭赴任。清政府加强对教官的考核选拔，其目的是加强对学校的控制，使学校培养出维护封建统治正常运转的人才，但也选拔出一批学识渊博、德行高尚的教师，从而有利于学校教育质量的提高。但随着清朝封建帝国的衰败，学校教育也是衰败不堪，教师也难以负担起培养人才的重任，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是教师的来源。以资入官体例在清朝历代都有，但入资为教官在雍正元年即行停止，其原因在于捐纳为教官者，多是不通文理的少年，以他们为学问优长或年老者的师长，显然不妥。但嘉庆三年又重新允许以资为教官，道光年间又推广捐例中准贡生捐中书，准增、附捐教职，致使教官成员复杂，不少人整天无所事事，与武夫营弁为伍，不事学习，不晓明体达用之学。他们往往无心教授学生，致使“弟子或终岁未尝一见其师，而师未尝一教其弟子”的状况普遍存在。

^①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40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② 璩鑫圭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鸦片战争时期教育》，第158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其次是对教官的考核流于形式。乾隆年间，以近来教职多衰老庸劣，滥竽充数，不但不能以道德礼义化导齐民，就是课士之职亦不克举，特命令各省督抚会同学政，严饬所属教官，务以实心实力劝学兴文。于是实行3年一次的甄别，考核教官。但是这一制度实行不久，其弊病就暴露出来，督抚和学政徇私情，互为一气，“不核其才望，不责其训课”，致使选拔出来的教官大多昏耄，徒具虚名。还有不少人“以学校为恤老怜贫之地，以司铎为投闲置散之官，甚至索贽见、勒节规，而不复问教学何义？谕训何事？”^①更有甚者，道光年间的教官考试屡屡出现雇请枪替、换卷传递、代书代作等作弊现象。连道光皇帝也不得不感叹：若不亟加整顿，何以拔真才而资师范？

对于教官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清政府不仅觉察到了，而且频频下令整顿。道光二年（1822年）上谕：“近日各省甄别州县，凡才具平庸年力就衰各员，率请改教。此等衰庸之员，即令司铎，安望克称厥职？嗣后各督抚于才不胜任之知县，未经得缺，将该员品学尚堪秉铎，切实声明，酌量奏请改教。”^②事隔4年之后，道光六年（1826年）又上谕：“近年生徒入学，不过轮期画到。查学之日，教习择其在家课读者背诵数章塞责。该教习亦止于画到，查学时始行到学。间有在学住宿者，并不教读。其宗室、觉罗及咸安宫、景山各官学，亦复如此。积习相沿，日就废弛，不可不严行饬禁。”^③24年之后，即道光三十年（1850年）再次上谕：“学校为教化之原，士子训课，责在教官；教官贤否，责在学政。近日教官一途，半皆年老衰庸及末学浅见之士。着各省学政严行考校。文行兼行者，方准列荐；庸劣不职者，即行甄别。至于月课岁考，尤须认真，课卷按季申送学政，诸生优劣学册，三年咨部备查。”^④尽管清政府三令五申，多次整顿，但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糟糕。同治年间，还出现了教官干预地方

① 璩鑫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鸦片战争时期教育》，第160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② 《清续文献通考》卷九七，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

③ 《清会典事例》卷三九三，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御制本。

④ 《清续文献通考》卷九七，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